

中國文哲專刊 22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

金盞
兩



(1949-2000)

上册

陳友冰◎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 22

海峽兩岸 唐代文學研究史

(1949 - 2000)

上冊

陳友冰 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 22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
(1949 - 2000)

著 者 陳友冰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27899814；27883620

排版印刷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 話：(02)26579211

定 價 (上、下冊：精裝) 新臺幣780元

(上、下冊：平裝) 新臺幣70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掃描二刷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801-5 (全套：精裝)

ISBN 957-671-802-3 (全套：平裝)



二〇〇〇年元旦於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出版說明

本所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次年正式聘請研究人員，推展研究工作。初期的研究方向有五：即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經學、中國哲學、比較哲學等。

爲推展研究工作，本所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半年刊），刊載本所同仁及海外學者的單篇論文；又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季刊），報導本所的學術活動，兼刊載國內外文學、哲學、經學研究狀況。另外，爲出版各種研究成果，陸續設有《中國文哲專刊》、《中國文哲論集》、《近代文史學人論著叢刊》、《經學研究叢刊》、《孟子學研究叢刊》、《當代儒學研究叢刊》、《古籍整理叢刊》、《圖書文獻專刊》，合計已出版近百種。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陳友冰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受臺灣「中華文化發展基金」的資助，在本所從事唐代文學研究，並參與本所古典文學方面的學術活動。這本《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1949－2000）》，除分述近半世紀海峽兩岸研究唐代文學的成果外，並比較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長短，書末另附有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論著目錄。

陳先生的著作是在本所訪問研究期間完成，且對了解近半世

紀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情況頗有助益，經本所出版委員會同意出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〇〇一年十月

再版前言

陳友冰

時間過得也真快，轉眼之間，這本《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出版已經三年。近日接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通知，云是書已庫存無多而學人仍有索求，因此決定再次印刷。因重版時間在即，已無法將初版時的一些錯漏作些訂正和補充，倒是由此勾起當年在文哲所訪問的一些記憶片斷：

在臺北時，經常乘坐公車往返於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之間。臺北的公交車上有一道獨特的風景：在司機與乘客間的隔板上，常有人貼些小詩和格言在上面，其中有的也讓我怦然心動，只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都漸漸地淡忘了，只剩下這一首：

小時候擠著公交車去上學，

只覺得等車那麼久，車上那麼擠，街道那麼髒；

今天開著私家車送孩子去上學：

不要等車了——反倒更匆忙，

車上不擠了——又覺空的慌，

街道敞亮了——心內更窩囊。

我多想倒流時光：

等車那麼久，車上那麼擠，街道那麼髒。

這是一種懷舊意識，這種對逝去歲月的緬懷和追憶，並不僅

僅體現在上述的生活狀況優劣上，而是覆蓋面相當廣闊的人類的一種共同情感。它沒有身份地位的差別，人生境遇的優劣而有所分別和懸殊，更不會因兩岸政治意識的分野而有所區隔。它就像陳年的美酒，反而會隨著歲月的流逝更加濃烈，特別是現實生活中難以尋覓的、特別美好、特值得珍惜的東西就更是如此，也許這就是白居易寫《憶江南》、李清照寫《聲聲慢》的原因所在。就我而言，近五年來雖然數次來台，但時常縈回在心頭、浮現在眼前的則是第一次來文哲所時的情形：學人宿舍後面的那座低矮的南港山坡，生物所邊那塊小小的生態示範區，文哲所二樓諸位聊天飲茶的休息廳。還有「家鐮橋」兩旁那肥大的大王椰子、婆娑的棕櫚樹和嬌豔的日本海棠，生態池心飄浮著睡蓮和那佇立在尖尖小荷上的翠鳥，那種在紅樓瓊閣環繞之中刻意營造的荒涼，常常使徜徉在其間的我產生無盡的遐想；那條一年四季皆是濃蔭匝地的山間小道，四分溪邊散落著的供休憩歇息的的長椅，每當薄暮時分、晨曦初現之際，我在那裏看著他鄉的月亮艱難的爬上南港山頭，或是細啾著溪上的晨霧慢慢地散去……這一切都讓我魂牽夢縈。

當然，最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是這本在文哲所完成的《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是書在撰寫過程中，兩岸近百位學者為這個課題提供本身資料和研究成果，不僅使這個課題資料更為詳實、豐厚，而且也證明了海峽兩岸的交流和溝通是兩岸學者的共同願望。這本小書出版後的反響也證明了這一點：2001年10月，是書在海峽兩岸分別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繁簡體版。緊接著就收到一些師友和讀者的書信和

電話，其中雖有一些涉及是書在研究資料和學術史上價值的讚語，但更多的是評估它在海峽兩岸學者之間的溝通、學術研究方面的互補所起的作用。例如傅璿琮先生寫道：「通過本書的閱讀，兩岸學者確可達到『同情的瞭解』，就是說，既彼此瞭解各自的優長和不足，又增進了彼此的交流和情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所進行的工作，其意義已經超越於一本幾百頁的書了」。羅聯添教授在通讀之後在給作者的信中也指出：是書的「第三章『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提出了兩岸研究的相似與共通及彼此的優長缺點，應視為本著作重要結論。至於期望加強兩岸學術交流，提出四個具體辦法，亦值得重視和參考」。2001年11月16日，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為這本小書的出版，舉辦「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互動與互通——《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研討會」，一方面就著作的本身進行研討，更多的學者則就兩岸學術交流的現狀，以及如何擴大合作渠道展開討論並達成了共識。海峽兩岸二十多位學者以及大陸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駐臺記者、臺灣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媒體參加會議，會後發表了報導或專訪。之後，海內外的一些媒體雜誌，如美國《世界日報》，大陸全國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臺北《中央日報》，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要報》，《人民政協報》、《安徽日報》、《新安晚報》、《合肥日報》陸續作出相關報導，一些學術雜誌隨即刊登了兩岸學者的一些書評，也多從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互動與互通著眼和落墨，如尚永亮教授和魯華峰先生分別在大陸的《文學評論》和臺灣的《學生書目》上撰文，不約而同將此書稱為「溝

通兩岸學術研究的津梁」。因此可以說，這個課題的確立和進行，研究成果在兩岸同時出版，其本身就是兩岸學術文化溝通交流、互助互補的明證。治國者必先收拾人心，治學者亦需做好彼此間的共存共榮、互補和互通。這本小書能在兩岸學者之間搭起一座互相瞭解的橋梁，是我最大的心願，也是對這本小書最大的褒揚和肯定。

值得慶幸的是，該課題的研究過程及其出版，也進一步擴大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合作渠道。2000年底，正在新竹清華大學任客座教授的傅璿琮先生和我應學海出版社社長李善馨先生之約，在臺北市郊的一個風景區石碇小聚。石碇在臺北縣的東南，巍峨的皇帝殿拱衛其北，著名的玄奘大學座落其右，是一個自然風景、文化氛圍俱佳的遊憩之地，臺北學術界一些同仁皆喜盤桓其間。善馨先生特意選了個既有山野小店風味又廚藝精致的「福保飯店」讓諸位歡聚。當時在座的有傅璿琮夫婦，臺灣大學的羅聯添先生，東海大學的楊承祖夫婦，交通大學的詹海雲先生，成功大學的楊文雄先生，李善馨先生和我。出於學者的習性，閒聊之中也不離本行。大家歷數近百年來學術大家及其成就，仰慕之中也深深為目前古典文學研究的困境而歎息，尤其是兩岸學者之間的隔閡和對對方學術觀點、研究成果的陌生。記得羅聯添先生曾舉臺灣中研院院士嚴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圖考》為例，這部積三十七年心血而成的煌煌巨著，臺灣的專業人士幾乎無人不曉，但在大陸卻很少有人知道。當羅先生說這話時，我也不知道是書，以為這是部地理學方面的專著，事後從史語所購了一部，才知道這部書中大量考證皆取自唐代詩文和史料，對研究唐代文學幫助極大。我

也提到當時大陸唐代文學研究中爭論正激烈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凡我遇到的臺灣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幾乎都問及此事，但對其原委始末、論爭要點多不甚了了。基於如此現狀，大家覺得可否以唐代文學研究為窗口，兩岸學人先做一些溝通交流的具體工作，比如，在目前的課題《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之後，可以再做兩岸的《詩經》、《文心雕龍》、明清小說、戲曲等方面研究史，尋繹兩岸古代文學研究走過的風風雨雨的歷程，通過各自優長的比較，品評其得失，探討其規律，以期兩岸學者對此有個全面、系統的瞭解。在此之前還可以先走一步，先編一部《中國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將兩岸三地五十多年來唐代文學研究中優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論著選編出來，分別寫成「提要」和「摘要」，另附「述論」和目錄索引，使兩岸學人首先瞭解掌握對方學術思想、研究歷程和學術成果的精華所在等等。當時便確定由中國唐代學會會長傅璿琮教授和臺灣大學羅聯添教授任主編，由我來具體執行。事後此議得到了臺北「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和大陸安徽大學 211 工程的襄助，很快的運轉起來：2000 年 5 月，大陸的編纂人員在合肥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編寫提綱和體例；10 月在武漢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選目；2001 年 8 月我應臺灣大學之邀赴台，講學之余便與羅聯添、李豐楙諸位先生具體籌劃此事並召開了臺灣方面編纂人員第一次會議；2001 年 11 月和 2002 年 10 月，兩岸的部分編纂人員又在臺北的「國科會人文中心」和臺灣大學召開兩次討論會，統一體例、瞭解進度，研討編撰中出現的問題。兩岸眾多學者為了一個課題如此頻繁的聚會、討論、交流於兩岸，據我所知，也是非常少見的。2004 年 10

月，這套八卷十冊的《唐代文學論著集成》正式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發行，前後歷時五年，完成了兩岸三地十七位學者首次大型合作。

以上即是我由《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的再版所逗惹起的回憶，拉拉雜雜，有汗前輩、同儕和廣大讀者清目，萬乞宥諒！

陳友冰 2004年12月12日
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

序

傅璇琮

去冬今春，我分別在北京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刊物上讀到過陳友冰先生的兩篇專文，即關於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以及臺灣學界唐代文學研究述論。現在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通閱全書，不期有兩種心情，一是感謝，二是欽敬，油然而生。我想這不單是大陸學者，就是臺灣學者，也會與我有同感的。

所謂感謝，我確實認為，我們現在正是處於高科技、信息化的時代，對新世紀學術研究來說，信息量將是促進發展、提高品位的重要因素，誰在這方面作得富有成效，誰就將居於先行者之列。近五十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包括唐代文學研究，由於種種客觀原因，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海峽兩岸信息互不相通，極為隔膜，對學術研究十分不利。現在通過陳友冰先生的這部專著，我們海峽兩岸的學者，都能對對方的學術行程有一個清晰的了解，眼光豁然開朗，胸襟頓然寬暢。沒有陳友冰先生這幾年的沉潛操作，這種境界我們是達不到的。這就是我們學人一種傳統的銘感之情。

所謂欽敬，有兩層意思。一是陳友冰先生這樣做，為研究者提供查獲資料的方便，這實是一種奉獻。現在大陸學者中有一種

(2)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 上冊

趨向，就是即使搞唐代一朝代文學的，專業領域也越來越細，搞詩的不關心文、賦，更不問及傳奇小說，作初盛唐的不關心中晚唐，因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整體進展情況，就不很清楚。我想，不少學者，特別是中青年，就可以通過本書，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和利用較多和有用的知識資料，從而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我曾經提到過，我們一些前輩學者，常常是自己動手編制過資料書和工具書。如陳援菴先生，是人們熟知的有深厚基礎和精湛修養的史學家，他撰寫過多種著作，但也編過好幾部工具書，如《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釋氏疑年錄》。臺灣老一輩學者如嚴耕望先生編著有《唐仆尚丞郎表》，現在的羅聯添先生編有《唐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續編。這些切實有用之書，實際上是浸融着一種可敬的學術奉獻精神的，確使人欽佩。

我所說的欽敬之情另一層意思，是陳友冰先生的識力。本書不是一般的學術報導，實際上是一種學術通論。如記述大陸五十年的研究進程，無論是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期間，以及「文革」後，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創新時期，在提供客觀的大量的資料之餘，總要加以評論，對臺灣的幾個時期，也是如此。特別是第三章《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充分肯定兩岸學者的成就和各自的優勢，就在比較中顯示彼此的消長，而在具體評述中又適當指出兩岸在某些領域各有所不足。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緒論中曾表述過這樣的意思：世界上的事業是要靠一種熱情才能做成的，但我們研究歷史，一種較高的層次，即哲學歷史，就要有「理性」，他明確地說「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北京：三聯書店王造時譯本，1956年）。這倒能啓人思索。陳

友冰先生是大陸安徽學者，現在擔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有一定行政職務，近幾年他又到臺灣作學術訪問，結識臺灣南北各地的不少學者，交情不淺。但他仍能對兩岸彼此的學術作出自己的評論，這就不僅需有熱情，更要有學術上的一種「理性」。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提出對古今學術史，「應具了解之同情」。就是說，了解作為同情的前提，同情又作為了解的趨向，由此就可以達成一種超越於狹隘功利是非的通識。通過本書的閱讀，兩岸學者確可達到「同情的了解」，就是說，既彼此了解各自的優長與不足，又增進彼此的交流與情誼。陳友冰先生這樣做，其意義已經超越於一本幾百頁的書了。

近五十年來，中國的唐代文學研究，包括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其總體成就確是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對這一有特色的學術領域，作一種學術史的探索，陳友冰先生此書確是一部創新之作。我們研究學術史，不能只局限於古代，在新世紀全球化發展的新環境，應當把視野拓展到現當代，這樣才能使我們更貼近社會，建設一個有科學含義的現代學科。

關於本書的內容，我就不詳作介紹，讀者通閱之後，所得一定比我還多。我這裡想再談談一些個人感想。

臺灣學者同行，我最早熟識的是羅聯添先生和楊承祖先生。十年前我曾有一文介紹羅先生的《韓愈研究》及《唐代文學論集》，刊於一九九二年的《中國典籍與文化》創刊號。羅先生後來囑其高足撰文，介紹我的《唐代科學與文學》，刊於臺灣《漢學研究》上，自此就開始了我們深切的學術交流。八十年代中

期，我邀約二十幾位唐代文學研究同行作《唐才子傳校箋》，《唐才子傳》卷四王季友傳，其中說：「家貧賣屐，好事者多攜酒就之。」後世多以此作為王季友的事跡。其實這是本於杜甫為王季友所寫的《可嘆》詩「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攜酒」。楊承祖先生曾有《杜詩用事後人誤為史實例》一文（刊於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3年），文中指出杜詩這裡並非寫實，是暗用謝承《後漢書·劉勤傳》。我曾有機會讀到此文，覺得所考新奇而又可信，就舉以告作此傳箋證的山西大學儲仲君教授。按照通例，我們作箋證凡引用現代成果的應註明出處，但限於當時情況，未註明。後我於一九九〇年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唐代文學學會年會上見到楊先生，向他談起此事，他聽了甚為欣然，此後就開始了我們切磋學問的交誼。

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我應新竹清華大學之邀，去該校中文系教學一學期，同時又至臺北、臺中、臺南等地大學、研究機構講學，因此認識的學者友人更多，除與我年齡相若的如汪中、阮廷瑜、羅宗濤、王壽南等幾位教授外，還有差不多二十幾位中青年學界傑出人才。這樣，我對臺灣的古典文學研究學風有具體親切的了解。陳友冰先生書中談及臺灣唐代文學研究的特色和優長，其中有「海外資料比較豐富，學術資訊比較靈通」，我確有同感。我感到臺灣文史學界對大陸的學術成果是很關切的，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在他們的論文中總要引錄不少大陸的專著與論文。我在教課中，有時出題讓學生作一些專題報告，他（她）們所交的讀書小結，首先是列出與題目有關的大陸方面的成果，真使我驚異。相比之下，大陸學者對臺灣的具體成

果卻了解得很不夠。如我在七十年代後期寫有《韋應物系年考證》，刊於《文史》第五輯（1979年5月），現從陳友冰先生書中，得知羅聯添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已發表有《韋應物事跡系年》。又如我在一九八二年底寫成《唐代科學與文學》一書，一九八四年出版，此書主要從文化背景，通過科學考試，探討唐代士人的生活與心態，以及文學風氣，但對考試文體卻涉及不多。現得知臺灣王夢鷗先生有《晚唐舉業與詩賦格樣》（《東方雜誌》，1983年16卷9期），羅聯添先生有《唐代進士科試詩賦的開始及相關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85年第17期），張正體先生有《唐代科學制度與詩賦體制研究》（《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7年20卷1期）。這對進一步了解唐代科學考試及文體沿革就很有參考價值。

我有一個想法，前五十年，大部分時間由於情況壅隔，彼此不通，對研究確有不利一面。但事情也有另一面的，即由於上述情況，對臺灣來說，卻形成、保持自己獨有的治學風尚，這倒是很值得思考。總的說來，臺灣的治學風尚，似乎與傳統學風更接近一些，這對我們上年歲的人來說，似乎更有一種親切感。陳友冰先生書中所說的臺灣學術著作「選題細密，能小中見大」，以及臺灣學者對詩歌格律頗有研究，且能寫出古詩美文，似均與此有關。進入新世紀，兩岸學術交流將進一步發展，我相信，彼此必能更好發揚各自優勢與特有的治學風尚，攜手共進。

陳友冰先生在第四章《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思考與前瞻》中，對唐代文學學科建設提出很有見解的建議，我很贊同。我以為，特別是現在，我們更應進一步擴展視野，建立開放型的文學